

孔子

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(中)



正是这个不竭的思想源泉，在他身后的二千多年的时间里，始终浇灌着后人的心灵之田。

孔子“理想国”的模板来自他向往中的尧、舜、禹的时代。他在《论语·泰伯》篇中，就毫无保留地歌颂了这三位先王的功绩，比如，称尧：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，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！”这样美好的时代，具体来说，就是《礼记·礼运》中所谓“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”的“大同”景象。

当然，“大同”过于遥远，相比这些久远的先王，孔子更推崇吸取了夏商之精华的周代制度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而周代的好处自然在于“周有大赉，善人是富。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”。这种美好的社会就被对应地概括为“小康”。从诉求

上讲，大同与小康并无本质区别，都是实现一种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；区别在于，前者天然存在、无需额外条件，而后者需要执政者加以制度的保证。这种制度，就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“礼”，保证“礼”得以实施的人被称作“仁人”，其所具有的品德，也就是“仁”。

孔子认为，“礼”首先应在国家的层面上，得到统治者的推广。其体现在于各种祭祀，包括天、地、祖先、山川、五祀（门神、灶神、灶神、灶神、灶神）等。其中每一项并非空泛之谈，而是都有实际含义，比如祭天的意义在于，天气的变化决定播种、收割等农时农事的对应；五祀则涉及日常生活的各种制度、规范。其次，“礼”在更加具体的日常层面上，还直接体现在“货力、辞让、饮食、冠昏、丧祭、射御、朝聘”等，涉及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在《礼记·礼运》中，孔子向弟子

言偃展现了他以“礼”为核心的理想世界，并阐明了讲“礼”的目的和意义，在于“礼者君之大柄也，所以别嫌明微，俟鬼神，考制度，别仁义，所以治政安君也”。不过，这些“治政安君”之道并不完全为各国君主所理解。令身居卫国的孔子不由向弟子冉有感叹道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

事实上，孔子曾经拥有过数年的施政经历：他于五十一到五十五岁期间（前501年—前497年）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，并以大司寇行相事。他的施政经历以“堕三都”失败而告终。或许是觉得自己以“礼”为核心的治政安君策略过于抽象，孔子晚年时又向另一位弟子曾参，也就是未门弟子曾子，进一步阐明了“礼”的实际用途。只不过这次，孔子把说法换成了更加直白的“明王之道”。

曾子先替孔子向我们解释了何谓“明王”——“不劳不费之谓明王”。孔子指出，要实践与古代贤君一样的明王之道，需要做好“七教”和“三至”两大方面，实现“内修七教而上不劳，外行三至而财不费”，达到不费公帑也能守卫国家、外征强敌的强国目的。反过来说，

既劳又费”就是阻碍东周国家实现礼制明邦的最大阻碍。简而言之，军役、军费繁重，还总没有尽头。那么，“七教”、“三至”何谓：

上敬老则下益孝，上尊齿则下益悌，上乐施则下益宽，上亲贤则下择友，上好德则下不隐，上恶贪则下耻争，上廉让则下耻节，此之谓七教。

至礼不让，而天下治；至赏不费，而天下士悦；至乐无声，而天下民和。明王笃行三至，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，天下之士可得而臣，天下之民可得而用。

为了帮助年轻的曾参理解一个完美国家的运行方式，孔子先用七组“上、下”对偶的排比句，具体描述了“礼”在操作层面的内容和社会功能。而这就是一种“仁君”的统治方式，它将为国家的良好运行提供社会大众的支持。当国家遵循“七教”，走上正轨之

后，则可以通过“三至”，来实现“明王”的完美统治：对天下的贤良给予最大的尊崇（至礼），给天下的士人给予最不吝啬的奖赏（至赏），向天下的人民给予最好的礼乐（至乐）。有了这样的管理机制，能使君主得到百姓的拥护，民众亲附，军队出战得胜还朝。

有如上古贤王的当代“明王”/仁君，具备各种惜民、尚贤、兼听、明察的美德，其所建立的令所有人都满意，内部稳固、对外无敌的最佳国度，就是孔子心中始终追求的那个“理想王国”。

然而，当居卫的孔子再次面对冉有困惑的眼神时，他对自己心中这个“理想国”的建立，也未必如当初那般坚定。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”孔子大概也明白，已过耳顺之年的他将无法再拥有另一个三十年，期待一位能带来仁政的明王了。

